

张申府与清华大学哲学系

○钱耕森（1951—1952哲学） 沈素珍

编者按：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河北献县人。1931—1936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申府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谨以此文纪念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

张申府是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公众人物、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他于1930年9月—1936年7月，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书，前后约7年，是他一生教书生涯中最长的一次，也是最不平凡的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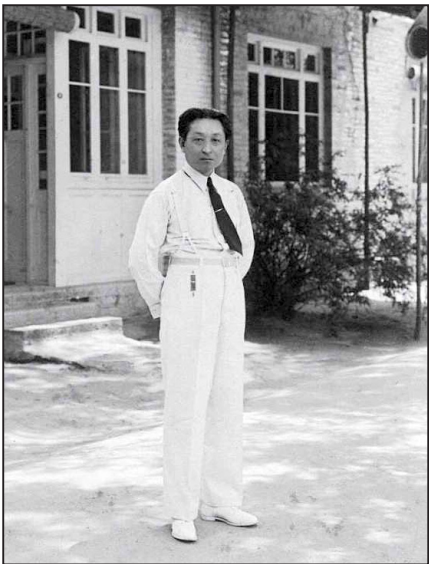
张申府在清华教书7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0年暑假后至1931年暑假，为讲师。第二阶段从1931年暑假后至1936年暑假，为教授。张申府后来曾回忆：1931年“暑假后我即受清华大学之聘，任专任教授（哲学系），此外还继续在北大教二小时；中大保留二小时教英文翻译。暑假末即移住清华南院九号宿舍，直到1936年7月。”（《张申府文集》，下引简称《文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4页）

开了六门课

张申府自1929年暑假后至1931年暑假前，先后在中大、北大、北师大、清华、燕大五所高校所教的课程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1930年至1936年，我任清华大学教授，教逻辑和西洋哲学

史。”“当时清华大学的逻辑课开了三个班，第一班是金岳霖先生教，我教第二班，另有一位教第三班。”（《文集》，第三卷，第189、490页）1933—1934两年，他“继续在清华与北大教书，除一般逻辑及西洋哲学史外，并教数理逻辑与罗素哲学。数理逻辑以《数理》（Principle Mathematical）为蓝本。在北大教罗素哲学，译出了罗素的《哲学大纲》半部，印出来作讲义”（《文集》，第三卷，第554页）。张申府在清华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史”。同时他又在北大讲授“数理逻辑”，在师大讲授“现代哲学”，“都受到学生们欢迎”（《张岱年全集》，下引简称《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卷，第547页）。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深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在大学讲坛上宣讲尚属罕见”。而张申府“在大学讲坛上鼓吹辩证唯物论，这是难能可贵的。”（《全集》，第8卷，第458页）加上上述“英文翻译”，共六门课。他教书的同时，又写文章，又译书，还当主编。

张申府在清华教书时，“论学与金岳霖、冯友兰颇相契合”（《全集》，第8卷，第547页）。他读了金岳霖的《论自相矛盾》一文（《哲学评论》1927年，第4期），深感“解析（即分析，引者注）之精，更足使人钦佩”，并由衷地高度评



张申府在清华大学照澜院9号寓所前

价道：“金先生可算得今日中国哲学界（如果有这么一界）的第一人。若他，乃不是专门拾人牙慧的。若他，乃不是以考据欺人的。”（《文集》，第二卷，第101页）金岳霖素有“金逻辑”之美誉。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三位教授以及沈有鼎、张岱年两位青年教师等“鉴于逻辑在哲学中之重要及在中国原有哲学中之不发达，故亦拟多设关于此方面之课程以资补救。因此之故，本校哲学在外间有逻辑派之称”（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下引简称《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可见，张申府在清华教书可谓得心应手，深孚众望。所以，1933年8月31日，“《校刊》第514期发布消息：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在校服务已满5年，照章应于本年休假一年，并赴欧洲考察，校长已聘蒋廷黻代理文学院院长，张申府（崧

年）代理哲学系主任”（《初编》，第151页）。他也成了一系之主了。

任副刊主编

1932年，张申府继续在清华与北大教书，但他“不记得是何因缘，这年初，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等邀我在他们的报上主编一个副刊，题名《世界思潮》”。他从1932年9月初—1934年底，头一年是周刊，第二年是双周刊，共出了88期。张申府的编辑宗旨很明确，针对现实问题，大力介绍世界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曾借这个机会尽力显扬或介绍了不少新思想、新理论、新哲学、新科学、新人物、新事、新物、新书、新期刊”（《文集》，第三卷，第554页）。张申府“在《大公报》主编《世界思潮》副刊，登载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和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用很大篇幅宣扬辩证唯物论”（《全集》，第8卷，第547页）。因此，“这期间报馆曾受到南京国民党严厉谴责，诋为一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危害国民政府，最后才不得不停刊！”（《文集》，第三卷，第554页）张申府办的这个副刊，也为系里同仁提供了发表文章的一个新平台。

冯友兰所撰写的《新对话》一文共四部分，前三部分分别发表于1932年9月3日和10日、10月8日、12月8日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其第四部分因故另发）。他主张共相实在之说，提出“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的著名观点，强调“理在事先”。同事张荫麟撰文与冯友兰辩论，认为共相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在的两篇文章，也发表在这个副刊上。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1931年我在《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新对话》。1937年我在《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哲学与逻辑》。在这些文章中，‘新理学’的主要观点已有了萌芽。”而“新理学”的理念，对于冯友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实是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冯友兰正是以“新理学”而卓然自成一体，彪炳于史册。

特别是张岱年，他是张申府的小弟，他们兄弟俩又是清华哲学系的同事。他从1932年9月—1934年1月写了26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从1932年9月10日第二期起到1934年3月8日第六十七期止，既发表了有关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文章，又发表了有关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文章，特别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俨然像一位哲学专栏作家。

并且，张申府还以主编身份对1933年5月25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第三十九期上刊登的张岱年所撰写的《论外在的实在》这篇重要文章，特意加了按语，予以高度评价：“季同（张岱年的别名——引者注）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编者特记。”可见，其用心良苦，意在通过按语，一方面，以资鼓励其弟要继续写好文章；另一方面，则以资激

发广大读者的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所以，张岱年晚年回忆时还感念不忘地说：“1932年吾兄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使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长短不同的学术文章，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为我参加学术论坛的开始。”（《全集》，第8卷，第577—578页）

学术成就：“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

张申府在清华教书期间发表的哲学代表作，主要有《客观与唯物》、《现代哲学的主潮》、《解析的解析》等论文和《所思》专著，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冯友兰说：1931年“哲学界开始新哲学与唯物辩证法问题论战。张君励、倭伊铿(Eucken (1846—1926)，又译倭铿，德国哲学家——引者注)合著《人生观问题》出版。杜威《哲学与文明》出版。张崧年《所思》出版”（《初编》，第113页）。《所思》初版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很快就由大江书铺再版。于是，张申府又写了《续所思》，发表于1913—1914年的《大公报·世界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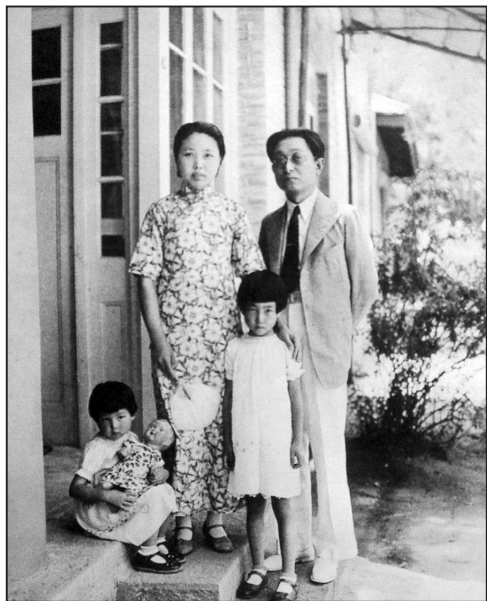
在这场论战中，有的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违背逻辑的，是不能成立的”；有的认为，“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毫无价值的”。张岱年说：“这两派各有所偏。张申府既提倡形式逻辑……又高度宣扬辩证法，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区别开来。当时张申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接着说：“关于这个问题，直到50年代才正式解决，学术界既肯定了辩证法的真理价值，又承认了形式逻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辑的科学意义。”（《全集》，第8卷，第532页）

张申府又认为，“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是“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是“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并认为，二者“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还认为：“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文集》，第二卷，第185—186页）他还企图把“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法”和“孔子的仁学”“相提并论”、“兼综起来”。

所以，张申府在清华任教期间，是“在学术界名望最高的时期”（《全集》，第8卷，第548页）。当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北平



1935年夏，张申府与夫人刘清扬、大女儿刘方明、小女儿刘方清在清华大学照澜院9号寓所前

大北书局出版），分章评述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和张申府等的思想，认为“张申府是唯物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全集》，第8卷，第527页）。孙道昇于1935年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中（《国闻周报》十二卷45期），也分别评述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和张申府等的思想，认为“张申府、张季同为解析唯物论的代表”（《全集》，第8卷，第585页）。

张申府更明确提出要“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其理由则是：“孔子代表中国好的文化。罗素代表西洋好的文化。列宁则代表已经开始的偏于西洋的未来世界的好文化。中国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仁，这自应以孔子为代表。西洋古代文化最大的贡献是逻辑与几何，西洋近代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科学法。罗素适可以代表三者……同时罗素自己还代表与其数理逻辑一体而为现代哲学最大贡献的逻辑解析。至已经开始而偏于西洋的未来世界文化，其中心哲学与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最可以为之代表的就是列宁。辩证唯物论，虽成自西洋近代，恰是中国古哲学与方法的真传统。”（《文集》，第二卷，第632页）

张岱年说：“吾兄申府多次提出‘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即将列宁的唯物辩证法与罗素的逻辑解析法和孔子的仁学统一起来。我颇同意。”（《全集》，第8卷，第585页）果然，他在其启发下，“将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全集》，第8卷，第584页），创新出我们称之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成为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

的一个典范。张申府虽未有写出一部大书来构造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的思想在中、西、马三种哲学结合的探索过程中，显然具有先驱的尝试意义与对后学的启迪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总指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动华北事变，民族危亡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

当时，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据张申府所知，是以清华园为中心的。学生中，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地下党员和一些爱国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说：“我的课名为逻辑，其实多是政治评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每次上课之前或临下课时，我都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的政治局势告诉给我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了解更多的时事。”（《文集》，第三卷，第490页）北平的救亡运动之所以是以清华为中心，“原因之一是梅贻琦先生任校长时，号称教授治校，政治比较开明，为学生的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文集》，第三卷，第489页）。

广大的进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终于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耻辱越来越厉害了，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再不能勉强安心讲学了”。于是，“这年秋后，以清华学生为首各校学生有北平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简称学联），我也联合北大、中大、师大、法商学院有共同思想感受的同人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

者同盟’。到了这年12月9日，便由各校学生在北平街头举行了游行，公开喊出大快人心震动人心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谓‘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游行时是由我与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及姚克广（清华学生，即姚依林）任总指挥的”（《文集》，第三卷，第555页）。

他又回忆说：“我记得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同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进行。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也就算是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队伍游行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就有一个清华的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走，并随时来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告诉我们。”（《文集》，第三卷，第491页）

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于一周后的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局关闭了所有的城门以阻止城外学生进城参加游行，但城外两千多名学生奋勇冲进了西便门。张申府坐在一辆人力车上，随着游行队伍向前走，并巧救了一名被军警追赶着的女学生。

“一二·九”运动，迅速地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北平学联”和“北平院校（包括东北大学）”的师生于1936年1月联合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张申府和吴觉先（武剑西）、潘怀素、程希孟、章友江、黄松龄、严景耀、杨秀峰、许德珩等进步教授都参加了。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国会”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与“北平学联”又共同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省，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工农、妇女五个部。张申府说：“总务部由我负责……杨秀峰任顾问，他耳朵虽然不好，但是许多主意都是由他拿的，在救国会中起了指导作用。经杨秀峰的介绍，我认识了彭真同志，当时人们称他为‘高先生’，并由此认识了林铁、肖明等人。”（《文集》，第三卷，第492页）接着，上海由著名的“七君子”等人筹划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七君子之长的沈钧儒负责。南北团结联合，相互声援，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张申府于同日上午，刚从城内大乘寺19号家中往西单清华返校班车站去的路上，突然被两个便衣逮捕了。他说：“那些抓我的人非常高兴，他们口称‘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头子’……我本是预备躲一躲的，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躲就被捕了……刘清扬也被捕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和刘清扬押解到宣武门外的侦缉总队。一到那里就把我关到木笼里，后来又把我放出了木笼。总队的队长姓马，他对我说，你太太给你求情了。原来这个姓马的是回民，刘清扬也是回民，刘清扬借此向那个姓马的求情，才把我从木笼里放了出来……我们又被送到前门内的警察局第三厅，被关在一个西屋里……靠北边是政治犯，多是学生，也有教员……这些人主要是因为搞学生运动、参加‘一二·九’游行被捕的……大约三月十几号，警察局把我、刘清扬还有十几位学生，一同解到位于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此地俗称炮局

子。不久前，抗日将领吉鸿昌在这里被杀害。到了监狱，首先是队长‘训话’，此人粗暴野蛮，他总是‘张崧年’、‘张崧年’地喊着我的名字训斥，我非常憎恨他，所以出狱后，立刻把我的名字改为申府（申府原为号）。队长‘训话’后，我被戴上脚镣，关进牢房。”

张申府说：“我被捕后，地下共产党组织积极营救，家属和朋友也设法活动。当时任女一中校长的孙荪荃到南京找到冯玉祥，请冯从中帮忙，因为当时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统治北平，而宋曾是冯玉祥的部下……随着形势的逐渐好转，终于在5月8日被释放恢复了自由。我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七十天。”

张申府出狱后回到清华继续教书。但“不料到了暑假，有人提出我在哲学课堂上讲时事太多，学校借此把我解聘了。在此期间，学校还开除了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最终我还是被迫离开了讲坛，离开了可爱的清华园。”（以上均引自《文集》，第三卷，第493—495页）

1936年7月2日，冯友兰出席第一〇九次评议会，“听取梅贻琦关于商洽张崧年教授休假经过情形及调查张教授在校任职状况后，根据清华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有关规定，决定自8月1日起解除张崧年聘约（全体通过）”（《初编》，第190页）。

张岱年很遗憾地说：“申府因为参加爱国运动而受到了迫害。张申府被迫离开清华，不但是清华哲学系的损失，而且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全集》，第8卷，第548页）